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

潘旭澜 文学评论选



.7

ZHONGGUODANGDAIWENXUEPINGLUNCONGSHU

潘旭澜文学评论选

责任编辑：曾果伟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73,000 印张：8 印数：1—2,800

统一书号：10109·1784 定价：(平装)0.92元(简易精装)1.10元



作者近影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序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是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密切合作下编辑的一套当代文学评论家的选集汇编。为当代文学评论出版丛书，建国以来，这是头一次。

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当代文学评论的经验，扩大当代文学评论的队伍，提高当代文学评论的质量，促进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

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是文学事业的双翼。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相互借重，共同前进。我们党历来认为，文艺评论是进行文艺斗争和繁荣文艺创作的重要手段。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但由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作家为标帜，而且以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评论家为标帜。出现一个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和出现一个伟大的作家，对于文学史来说，意义同等重要。

但是，由于种种失误和偏见，文学评论有时被当作凌驾于文学创作之上的监督哨，面目令人生畏；有时被当成推销文学作品的广告牌，脸色显得苍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文学评论的状况大为改观。文学评论不但为文学创作开路，而且为文学创作服务；不但以尽可能正确的历史观点对创作进行思想分析，而且以尽可能正确的

美学观点对创作进行艺术分析。文学评论在拨乱反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方面；在同“两个凡是”进行斗争、在批判和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进行两条战线斗争方面；在大力扶植新创作，为日趋繁荣的短篇小说、勃然兴起的中篇小说和方兴未艾的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呐喊欢呼方面；在热情鼓励题材、体裁、风格、流派的多样化，坚定不移地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方面：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文学评论积极参与整个意识形态拨乱反正的重大斗争，完成了历史的使命。然而，只要面对现实，面对党和人民对文学事业的要求，就不能不承认，文学评论不但落后于时代，而且落后于创作。这种落后状态主要表现在：文学评论对文学创作的新鲜经验总结不够，对文学创作提出的新问题研究不力，在推动文学创作发展上站得不高，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和科学的预见性。

刚刚开过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向文学评论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这对于今后我国当代文学评论工作，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学评论工作者必须以此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坚持先进的世界观，努力以共产主义精神影响和教育人民，这就是我们的方向。

文学评论的队伍建设是个大问题。评论队伍的建设，一是思想建设，二是组织建设；既要提高，又要扩大。我们文学评论工作者应该认真学习十二大文件，划清共产主义和“共产风”的界限，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培养自己成为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共产主义战

士。只有使自己成为自觉的先进战士，才能真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而不致迷失方向，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任务繁重而队伍甚小，这是个矛盾，扩大队伍的问题迫在眉睫。一九八二年七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河北涿县召开“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就大力发展文艺评论工作和充实文艺评论队伍的问题做了部署，响亮地提出“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的口号。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今后的文学评论工作，势必有一个较大规模的发展。

我们这套丛书愿为文学评论的发展铺路。这套丛书倘能收到实效，还可以继续编下去，借以促进人才的更多发现。

我们仓促上阵，又无经验，缺点一定不少，欢迎批评指正。

冯 牧 阎 纲 刘锡诚

1982年10月13日

目 次

前 言.....	(1)
----------	-------

胆识与艺术创新

——谈《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5)
--------------------	-------

论《芙蓉镇》的人物塑造	(16)
-------------------	--------

山里人的赤忱歌手

——古华论.....	(35)
------------	--------

撼动心灵与发人深思

——谈小说《心祭》.....	(64)
----------------	--------

长短·瞬间·剪辑

——读近年来部分短篇小说杂感.....	(71)
---------------------	--------

报告文学的新里程碑

——论《哥德巴赫猜想》集.....	(79)
-------------------	--------

五年来的报告文学	(95)
----------------	--------

这里有诗情诗意

——谈散文集《雕塑家传奇》.....	(114)
--------------------	-------

要深入地解剖人物的灵魂

——漫谈于冠群与吴一萍的形象.....	(123)
---------------------	-------

《红日》艺术成就论辩	(131)
------------------	-------

论杜鹏程的小说创作(155)

一部承前启后的力作

——论《在和平的日子里》.....(187)

关于《保卫延安》重写刍议(233)

前 言

收在这本选集里的十几篇文章，都是一九七九年以来写的。但在编选的时候，却不禁想到三十多年来的一些旧事，思绪联翩。

我读大学的时候，对文艺理论、中国外国文学、古代的现代的，都有兴趣，总觉得该读、想读的书是那么多而时间却那么少。面对文学、知识的海洋，我日益感到自己的无知。大约由于童年和少年时代接触中国古代诗文小说比新文学多些，感情也深些，加上别的一些原因，在大学高年级时，我打算此后在明、清小说方面多化点精力。我最初学写的一些经过认真思考，算得上评论，篇幅也较长的文章，就是关于清代小说的。不过，同时也写点新作品的评论。

大学毕业后留在原校，因工作需要被分配搞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不是原先盘算的“第一志愿”，但反正是文学，所以觉得并无不可，更何况那时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风气。当时，在不少人心目中，现代文学不是学术，大约因为年代近，又不存在文字、音韵、训诂问题，也不需考据罢（其实也要的）。本来，我只要搞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就可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可以不搞。然而，当代文学的重大现实意义和个人对它的浓厚兴趣，使我不去考虑“不稳定”、“危险性大”的问题，决

心和现代文学连着一起搞，在课堂里讲。这自然十分吃力，好在那时年轻经得起熬累。在我工作后的七、八年里，除了受命辅导同学编写现代文学教材外，个人写的东西多数是当代文学评论。

一九五七年以后，搞当代文学的确不容易。但是，除了我不能、不愿写的文章外，还有不少我认为优秀或比较好的作品可以评论——虽然评论这样的作品也得小心翼翼地避免触犯某些难以理解的戒律，提防突然打来的棍子。从一九六四年秋开始，我觉得自己不仅是“跟不上形势”，而且不想也无法再写什么。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那就更不用去说它了。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重新执笔为文，有十四年多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个字。这十几年本应是一生中最能为人民做点事的年华，却绝大部分在痛苦与悲愤的煎熬中过去。许多札记、资料、文稿、讲义也被“台风”刮得不知去向。不过，信念和意志并没有被摧毁。

近几年来，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繁荣，认为它不是学术的观点已经不易在公开场合听到了，这是可喜的。而当代文学的空前繁荣，影响的空前增长，更令人鼓舞。所以，我在继续搞点现代文学的同时，将自己较多的时间与精力用来搞当代文学。有些关心我的同志不大以为然，认为丢掉了现代文学可惜。我理解这种好意，但却不这样看问题。其实，我并不想放弃现代文学。退几步说，即使由于主客观原因，今后一直无法用较多的时间与精力搞现代文学，也不认为所学的一点东西是白费。文学固然可以划分许多范围，文学发展的历程固然可以分成若干段落，需要有所分工，有所侧重，一个人不宜平均使用力量，没有重点。但我却不想将这种划分绝对化，

弄得“左邻右舍”概不涉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只要有可能，不但现代文学，还有文艺理论、古典文学、外国文学都想再学一点。要说可惜的话，那是我以前学得太少太不够了。当代文学评论是不是学术，看来同其它方面的评论一样，不能一概而论，有是有不是。至于“危险”云云，不能说是杞忧，但我确信人民决不会允许“文化大革命”重演，历史前进的潮流谁也逆转不了。

这里所收的文章，大部分是谈新时期作家作品的。象我这样搞教学的人，由于任务、条件、环境的关系，对文学界的情况、动态的了解，既迟又少，评论新人新作是个显著的局限。不过，却可以少受他人先入之见的影响，按照自己读作品所得到的印象和看法来写评论。有不少新作品，我读后有一些想法，但没有时间写出来；或者别的同志发表的评论，已大体上包含了我想说而未说的见解，自然不必再去写了。除了关于新时期文学的文章外，还有三、四篇是谈五十年代几部名著的。这些名著当时和现在都拥有大量读者，它们的成就、经验和不足，是值得好好研究的。何况有的曾被横加批判、围剿，有的在评论界正常的讨论中有不同意见。然而，原有的许多中肯评论已经立了较高的起点，使人颇有“崔颢题诗在前头”之感。如果这几篇再探索有点参考价值，不是徒灾梨枣，我就很高兴了。

就各篇所涉及的范围来说，大多数是对一部作品的评论，也有对一位作家创作的综论，还有对新时期文学一个领域的鸟瞰。有些相关的作家论与作品论，是互为补充的，后写的一般都冀图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进展或发挥；为保持原貌和各自完整，略有重复之处就不予删去。我认为，如同没有终极真理一样，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局限的作家，不存在“止于至善”的作

品。所以，我在为一些优秀或比较好的作品而激动、欣喜的同时，也如实地谈了我觉得它们存在的不足或缺点。有两篇文章还是着重于谈问题的。爱之愈深而求之愈高，就是我写那些文字的心情。虽然自惟是严肃、真诚的，但为学识、阅历所限，可能有许多不当和谬误之处，今后愿意和大家一起继续探讨，努力求是。

开始编选这个集子时，曾想从《艺术断想》中选几篇。但自己再一看那些文章，所谈的问题、作品，都限于文学，更不止是当代文学，于丛书的要求不符合，就不予考虑。五、六十年代写的当代文学评论，因为已收在不久前出版的《中国作家艺术散论》里，而且差不多同时又被选印在别一套大规模丛书的若干专集里，所以这里也没有选。虽然所选都是一九七九年以来写的，但大体上可以反映我在当代文学评论方面所做的微末的工作。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的主编同志叫我搞这个集子，关心之情和鼓励之意，我很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有关同志对这本书的积极、热情，许多同志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我也在这里一并表示谢忱。

零零碎碎地说了我一些情况和想法，希望同集里的浅陋文章一起，得到前辈、同行、读者的指点和批评，此后能有所长进。写到这里，想起了“路漫漫其修远兮”这句话，就用它作为结束罢。

一九八四年仲春于复旦

胆识与艺术创新

——谈《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我认为，张一弓同志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刊《收获》一九八〇年第一期）是一部有胆识、有新意、有突破的优秀作品，是近年来我们文学创作的一个可喜的收获。

尽管写浮夸风、弄虚作假的作品，这不是第一个；尽管早在去年，作为千百万读者中的一个，我深为击节赞赏地先后读过《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鹕）和《黑旗》（刘真），但是，当我读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之后，心里不禁涌起巨大的波澜，并且久久地陷于沉思之中。这个中篇的惊心动魄的情节和场面，主人公的英雄品格和令人悲愤的遭遇，作品所揭示的惨痛的历史教训，总是萦回在我的脑际，撼动着我的心灵。

中篇作者的胆力，首先表现在敢于直面历史的真实，敢于正视我们生活中曾经存在的问题和阴暗面。作者以常见的倒叙手法，通过一九七九年新任地委书记亲自为李铜钟平反，将读者带到一九六〇年开春的李家寨大队。中篇以较多的篇幅，颇为深入细致地描绘了一场严重的饥荒。由于公社书记杨文秀的迫使，大队长张双喜虚报了产量，这个大队被多征购了十万斤粮食。于是，从立春那天起开始了一场春荒。每天吃清水煮萝卜。榆树皮也剥光了。不得已宰杀耕牛充饥，也解决不了多少

问题。断粮的第七天，全大队四百九十多人，全部患了浮肿病，一部分社员“已经挺在床上不会动弹”。烈属、“三堂总管”老杠叔，在快饿死时，直要求老伴将为他做的送老衣的棉花套子让他啃啃。这种揪人心肝、催人堕泪的景象，是三年困难时期某些农村出现过的情景的艺术概括和真实写照。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还很少有象这样尖锐、这样充分地描写这一时期的饥荒的作品。

胆和识是密切联系，互相为用的。有胆才可能有识。没有胆，追求“安全系数”，不敢正视现实，回避生活中确实存在或曾经出现过的矛盾和问题，将丰富复杂、有成功也有失误的生活一概涂上玫瑰色，只能人云亦云，对生活不可能有新的发现和认识。但是，胆又离不开识。没有识，一味大胆，片面追求尖锐，以写人之所不敢写为能事，甚至带着个人的偏激情绪，将生活中阴暗或丑恶的东西加以夸大，以致一叶障目，那就会背离革命现实主义，必然导致作品的不真实甚至歪曲生活，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敢于直面历史的真实，较充分地描绘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景象，而是从深广的背景上来表现这场饥荒是怎样发生的。没有疑问，李家寨饥荒的直接原因是高指标、高征购；应该对此直接负责的是公社书记杨文秀。如果作者将这一切仅仅归结为杨文秀个人的问题，或者按照惯常的老办法将他写成一个暗藏的阶级敌人，作品就会失去它应有的深度和意义。作者没有采取这种虽然便捷但却浅薄的写法。中篇第一章和第四章里，通过巧妙而又自然的穿插，叙述和描写了杨文秀到十里铺公社担任书记后的所作所为，揭示了一九六〇年这场春荒与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大大

发展起来的浮夸风的直接联系。浮夸风是左倾错误的产物，又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正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高潮中，刚刚上任的杨文秀，就提出“一个公社首先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一种似乎很革命而实际上极为荒谬、无知的“高论”。他命令村村队队砸锅炼铁，连门鼻、门搭勾都填进“小土群”里。他要老汉们挂着长须，妇女们穿着古装戏衣、打着“帅”字旗，下地劳动，表示赛过老黄忠和穆桂英。他在三级干部会上宣布一年“过江”，“迎接共产主义到来”，并且胡诌了几句不伦不类的“民谣”为证。这样一些在今天和将来看上去简直是《笑林广记》式的事，现在中年以上的人都是记忆犹新的。中篇作者选择这些似乎荒诞但却并非个别的真实现象，来勾画杨文秀的面目，是很有表现力的。这样一个“带头书记”，必然要搞高指标、高征购。带着出名升官的个人主义欲望，一心想要有“大发头”的杨文秀，个人思想品质当然大有问题，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土壤和气候，他的浮夸、弄虚作假是不会迅速地发展得这么严重，表演得这么淋漓尽致的。事实上，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以“全副精力”揣摩上级意图的产物。所以，他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批评、处理，反而大出风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特定时期“应运而生”的角色。也许有的同志认为，如果不写杨文秀个人思想品质上的问题，对浮夸风的揭露会更有力量。我以为不然。浮夸风固然有其客观的社会原因，但是大凡浮夸风、弄虚作假特别严重的地方、部门，都和负责人的思想品质有直接的关系。

中篇的作者还以简洁、洗炼的笔触，从其它一些方面来反映那个时期的浮夸风。比如，省报经常出号外报导叫人根本无法相信的“丰收卫星”的反科学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讲真话、

实事求是成了“右倾”。县委书记田振山提出一个指标已经过高的“持续跃进规划”，还受到地委严厉批评，被扣了一大堆帽子，以致他怀疑自己确实落后，诚恳地反了自己的“右倾”。在左倾错误、浮夸风的恶果已十分严重，本来应该大力纠正“左”的倾向时候，可是，由于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眼下的精神还是反右倾”。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浮夸风是那些年月的时代病。由于作者能够从“大跃进”、“反右倾”这样较为深广的背景上来探索和反映李家寨的饥荒，所以它就具有典型意义，揭示出永远不可忘记的惨痛的历史教训。于是，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要那么尖锐地描绘李家寨的饥荒景象。因为，只有真实、充分地反映饥荒景象，才有可能深刻地揭露浮夸风、弄虚作假的祸害，并为主人公李铜钟不寻常的行动的必要性提供合情合理、令人信服的根据。

中篇作者的胆识，突出地表现在描写李铜钟未经批准，连夜借走五万斤公粮，去解救即将饿死的群众这个事件上。由于这个非常的事件，复员残废军人、大队支部书记李铜钟，被作为“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并且戴着这样的大罪名死去。我们的文学创作中，似乎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作品写过这样的事件。这个构成中篇主要情节的事件，不论是出于作者的虚构，或者是生活中某一实有事件的艺术加工，它都是真实可信的。在饥饿那样揪人心肝地折磨着全村群众，死亡威胁着几百口社员，向公社、县里紧急呼吁又没能得到救助的危急情况下，“这个出生在逃荒路上、十岁那年就去给财主放羊的小长工，这个土改时的民兵队长、抗美援朝的志愿兵”，这个为祖国和人民流过血、献出过一条腿的李铜钟，他的高度的党性，他的火热的阶级感情，他的强烈的责任感，以至他的人类良知，都使他不

可能撒手不管，叫“大家掂上打狗棍，自谋生路”，更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勤劳的乡亲们一个个饿死。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出路是动用公粮。于是，他毫不迟疑地将个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甘心承担非常严重的后果，去干那后来被说是“抢劫国家仓库”的事，来解救几百口群众的生命。正如战争年代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一样，李铜钟这种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慷慨地自我牺牲的行为，是他的思想、品质、性格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完全可能甚至必然会有的事。当然，这和战争年代有所不同。那就是，战争年代面对的是敌人，为祖国和人民而牺牲自己，其必要性和意义是很明确的。李铜钟所面临的情况则很复杂，以前又没有这样的先例。在下决心自我牺牲时，必须从复杂的情况中判别是非，明确什么是人民和党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所以，李铜钟的行为，既是董存瑞等烈士伟大精神的继承，又是在和平时期的特殊情况下的发展。这里，完全可以将马克思赞扬普罗米修斯的话，用在李铜钟身上，他是“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博士论文〉序》）。普罗米修斯是神话中的人物。而在我们生活中，象李铜钟这样的伟大“殉道者”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普通干部、群众中都不乏其人。

借公粮的事件，李铜钟确实是道义上的“圣者”和英雄。从法律上来说，他被安上“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的大罪名，也是不公正，不能成立的。他在全村断粮七天时向上级的告急信如石沉大海，在几百条人命危在旦夕的情况下，他求得粮站主任、老战友朱老庆的同意和支持，开了借条、盖了血手印，借出了被征购过头的粮食，用来急救李家寨几百口生命，和劝阻柳树拐群众逃荒，这怎么能够说是“抢公粮”呢？诚然，